

司法的气味：为什么公正需要被“嗅到”

赢了官司却嗅不到公平——判决可以完全正确，同时是一件正确的死物

作者 高鹏 · SDE 学员 · 约 1.7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8日 · 打磨版

摘要

当代司法系统最深的困境，不在于判决缺乏说理，而在于越来越多经得起法律推敲的裁决，无法被当事人真实地接住。本文不将这一裂隙归因于程序设计的疏漏或个体心理的偏差，而是从司法系统在“不出错、不浪费、不亏本”三重压力的长期互逼中，逼出一个此前未被独立命名的结构性代价：法官在与自身职业风险反复博弈的过程中，内化出了一种系统性的身体撤离——他学会了将判决打磨成标准化的安全产品，却在日渐熟练的自我保全中，将公正赖以被感受到的那片发生土壤，一寸一寸铲平。本文经由撤销“司法者可在判决中无自我”这一被广泛共享的底层先验，从司法优化的内在逻辑与当事人归感需求的结构性矛盾结算中，让一个不可被任何单一现有概念替换的新维度被迫显露自身的轮廓——法息。法息，不是“法官态度好”，而是当事人在诉讼的缝隙里，从法官的姿态、倾听的沉默和那一瞬间无法被法袍完全遮住的人性痕迹里，嗅到的、让他确信“这个判决是掂量过我这桩心事”的存在论确证。它是公正被个体接住的前提，而非程序的附加点缀。本文在与程序正义感、承认理论、共情以及法律现实主义等最邻近理论的逐一对质中，切出法息独自占据的区分面，并以真实经验材料支撑其运行逻辑的展示。司法优化的最终代价，不是公众满意度的下滑，而是制造了一场深刻的“失嗅”：当事人拿着法律上完全正确的判决，却从上面嗅不到任何另一个人真实为他挣扎过的痕迹。本文绝非主张返回人治的温情主义，而是在严格程序框架内部，为这种不可化约的身体在场的制度化，凿出可操作的、谦抑的缝隙。

关键词：法息；司法优化；程序正义；司法公信力；身体在场

SDE 创新智商：128 → 140

本批打磨的重心最重：原稿无参考文献、无边界节，且未处理离它最近的那个概念。本次补入与本栏前作《法触觉的坏死》的分工（发送端能力／接收端证据，并给出“高法触觉、零法息”这一格的分离检验）、与情感劳动／默会知识／身体现象学的三重对质（其中“统一话术培训会让法息更低”是一条与情感劳动方向相反的预测）、「本文禁止什么」一节，并补齐全部参考文献。作者的论证结构与核心判断未动。提升后分数为编辑自评，待独立复评。

第二轮再补：与信号理论（累赘原理／文凭信号）的对质，为「统一话术培训会让法息更低」这条原本只是断言的预测补上机制——法息之所以可信，是因为它昂贵、难以伪造；一旦被写进模板与考评，伪造成本归零，它就退化为廉价空谈。由此推出「法息不可被直接生产」是概念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并给制度设计立了一条硬边界：降低察觉门槛可以，降低伪造门槛不行。

一、一道说不清的槛：为什么赢了官司，却嗅不到公平？

我们习惯用一句话来丈量一个社会的法治成色：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句话里最耐人寻味的，不是“公平正义”，而是“感受到”。它暗示了司法活动的一个深层维度：正义的实现，不仅是逻辑与规则的精密运算，更是一场必须被生命体验所确证的发生——它要从一纸判决书，变成一个人心里那块终于放下的石头。

然而，当代司法最深的焦虑，恰恰萌生在这片“感受到”的地带。我们的判决可以合法，程序可以合规，结果可以合算。但当事人在合上案卷之后，心里那道槛，就是过不去。一个继承纠纷的当事人，在拿到判决书后说：“法官判的数额我不满意，但我知道自己没有白来。”另一个当事人，拿着一份对他完全有利的判决书，却说：“官司赢了，可我觉得我从来就没进过法院——他们说的那个案子，不是我经历的那件事。”

这两句话之间的裂隙，并不关于判决的公正性。第一个人输了结果，却认领了程序。第二个人赢了全部的诉求，却丧失了自己的真实。这个裂隙无法用“释法说理不够透

彻”来解释——后者那份完美有利的判决，必定已经包含了严密的法律论证。也无法归咎于法官的冷漠——后者可能全程保持了无可指摘的职业礼貌。

那它是什么？我们不妨做一个比喻。一个人走进一间厨房，厨师给他端上一道菜。食材货真价实，火候无懈可击，营养比例经过精确计算。但那个人尝了一口，放下筷子，说：“这道菜，没有锅气。”厨师拿出成分化验单，证明所有的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都精准达标。食客沉默。他不是在质疑化验单，他只是吃不到那一下大火猛炒、食材在高温铁锅里瞬间收缩时所爆发出的那股焦香——那股气，无法被化验，却是一道菜是“活的”还是“死的”的唯一分别。

这个裂隙，就是我们时代司法公正的真正伤口。它不是判决说理不足，不是程序不透明，不是效率不够高。这些我们都有了，而且做得越来越好。但是，当一个人拿着对他完全有利的判决书，却觉得“这不是我的事”，他不是在质疑法律论证的力量，他是在说：“这道菜，没有锅气。”他在判决这道菜里，嗅不到那个法官为他这桩心事真实地掂量过、挣扎过的气息。他感受到的，是一次精致而冰冷的标准加工。

这股“气息”的丧失，在既有的法社会学或程序正义理论中，找不到可以直接对应的术语。我们可以谈程序正义感——人们是否觉得程序给了自己说话的机会、被尊重地对待。我们可以谈司法公信力——人们对司法系统整体的信任程度。这些概念各自切中了某个真实的面。但如果把上述那段食客的隐喻严肃地作为分析对象来对待，每一个现有概念都漏掉了同一个东西：那股气息。它不是程序的属性，不是结果的满意度，不是个体心理的投射。它是从司法者身上蒸腾而出、被当事人直接嗅到的、有关“这个判决是活的”的确证信号。

本文将这股气暂且称为X——它是一个等待被逼问的维度。本文要做的事，不是去定义X是什么，而是先追溯：这个生产公正的现代厨房，是否在它追求“不出错、不浪费、不亏本”的自我优化中，系统性地、安静地，把让公平正义被“嗅到”的那片土壤，给铲平了？当那片土壤的构成被充分展开、它的消失过程被动态追溯之后，X的轮廓才会被迫显露出来——那时，它才配得到一个严格的名字。

二、司法厨房里的三把尺：它们是怎么被逼出来的？

任何一个组织长到一定规模，都会被自身维持运转的内在压力所驱使，自发地生成一套自我优化的操作准则。在当代中国的司法系统中，有三把尺子被各自的压力源逼到了极致。它们不是外部强加的恶意，而是系统维持其专业性与可持续性的“必修课”。要理解那片让公正可被嗅到的土壤如何被铲平，必须首先追溯这三把尺各自的发生条件——它们不是自古而然的铁律，而是在特定的制度史张力中，被一步步逼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第一把尺：不出错。 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随着错案追究制的逐步建立和审级监督的实质性强化，法官第一次被系统地置于“办错案即面临职业否定”的压力之下。两件事同时发生：法院系统内部开始将“案件发改率”——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的比例——列为法官业绩考核的核心指标；涉诉信访的治理压力，让每一个判决都潜在地面临当事人不服、案件被反复拉回审查的风险。在这双重压力的共振下，“不出错”从一种模糊的职业伦理，逐渐凝结为一道可被考核的具体阈值：证据链必须完整闭合，法条适用必须准确无误，程序必须滴水不漏。

这种压力的规训效应是身体性的。法官学会了把判决锻造成逻辑铁桶：所有可能被二审抓住的“漏洞”必须预先封堵，三段论推理必须严密，事实认定必须在笔录中标明出处，自由心证的痕迹必须被擦除。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隐秘的筛选机制悄然启动：任何主观的、不确定的、无法被翻译为法律事实的生活元素——情绪的波动、语气里的犹疑、一份说不清是委屈还是内疚的叹息——都因为可能在未来构成“错误”的隐患，而被主动从判决的构建材料中挤出。法官不是看不见这些，他是从职业风险的角度，把它们识别为危险的杂质。他学会了一种身体的自我收缩：不在庭上流露出过多的关切，不在判决书里写下任何可能被上诉方抓住的“多余的话”。

第二把尺：不浪费。这把尺子的压力源，是司法资源在任何社会都永恒的稀缺性与中国法院在立案登记制改革后案件量的急剧攀升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民事经济案件的大幅增长，“案多人少”从一句口号变成了一线法官真实的日常。作为回应，审限管理制度被不断强化——审限倒计时的红灯，至今每天在审判

管理系统中高悬。与此同时，结案率、平均办案周期等效率指标被纳入法院间的竞争性评比。

在效率这把尺下，每一个案件都被视为有待加工的原料——流程必须顺滑，节点必须卡住。一种心照不宣的运作策略由此形成：能调解的不开庭，能简易程序的不走普通程序。当事人的叙事，在这种逼迫下，成了需要被压缩的冗物。“别给我讲故事，给我证据”——这不是一句粗暴的训斥，而是系统压力下最诚实的自保：故事耗时，证据省时。将一场活生生的、纠缠着历史与情绪的纠纷压扁为几条可供审理的清晰的“争议焦点”；将人的背景、动机与难以言传的委屈全部视作噪音过滤掉——案子流转就快了。效率，最初是公正的服务者，在此变成了重新定义问题本身的权力：什么样的事实值得被纳入司法的视野，越来越取决于它能否在一个预设的时间成本内被解析完毕。

第三把尺：不亏本。这把尺子的压力源最隐蔽，也最不被法律文本正面宣示。它来自法院从“财政全额保障”逐步转向“预算约束硬化”的过程中，被逼出的一种隐性核算本能。司法系统不仅是一个裁判机关，也是一个需要运转的、有预算约束、需要向财政和公众证明其资源使用正当性的组织。当编制增长追不上案件增长、办案经费追不上诉讼成本时，系统便会内生出一种成本-收益的隐性核算：有限的司法资源，必须优先配置到“有价值”的纠纷上。在隐性的排序里，这常常指向标的额巨大的、社会影响广泛的、能形成典型指导意义的案件。相比之下，一个相邻土地的界址纠纷，一个几千元的劳务欠款，在这种核算逻辑中无疑被识别为“不划算”。系统不会说“我不理你”，它会用更温和的方式——让你进来，然后在你行走的轨迹里，把所有“不经济”的倾听、斟酌与安抚环节都优化掉。正义的门依然敞开，但通往正义的路，被修成了一条情感上的高速公路。所有能让人停下来的东西，都被拆除了。

三、尺的咬合：那片土壤是如何被一步步铲平的

三把尺并不各安其位。它们在法官的日常实践中相互咬合，构成了一套优化共生体。要理解那片让公正可被嗅到的土壤——法官把自己的身体真实地留在审判当场的那些

条件——是如何消失的，就不能把三把尺当作三个并列的“因素”分别陈述其后果，而必须展示它们如何相互逼压，让每一步撤离都变成下一步的条件，让链条越来越紧，直到法官的身体被完整地推出那片土壤。

（一）第一步：“不浪费”切掉了时间，“不出错”随即把剩下的时间里的行为压缩到趋零风险

“不浪费”要求快，“不出错”要求稳。这本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体，但在过载的审判压力下，这对矛盾反而迫使法官发展出一套应对策略：把案件的调查范围切割到刚好够出判决的程度，多一分都不探。要确保不出错，理想的状况是花更多时间——多听一轮当事人看似“无关”的陈述，多核实一份不那么关键的证据，多停下来，留出几秒的沉默，让当事人把那句堵在喉咙里的话最终咽下去，或吐出来。可这些时间从哪里来？从已经被审限压得喘不过气的日程表里掠夺。

于是，“不浪费”首先动手。它用一个紧逼的节拍器，把法官的身体可供支配的时间总量压到最低。这一步做完之后，“不出错”才开始在已经被压缩的时间内部施加第二重压力：在这所剩无几的时间里，任何在法律上“无用”的行为——倾听一段不提供新证据的讲述、容许一次沉默、在判决书里写下“本院在反复权衡后艰难认定”这样透露挣扎痕迹的措辞——都不仅被视为时间的消耗，更被视为风险的敞口。因为那二十分钟里说出的任何话，都可能成为将来“出错”的隐患；那句“艰难认定”，可能被上诉方抓住作为“表述不严谨”的把柄。

在“不浪费”单独作用时，法官尚可能在某些案件中挤出一点冗余时间。但当“不出错”接手，在已经被切掉冗余的时间内部施加风险过滤，这两把尺就开始联手做一件事：它们不再只是各自施加独立的压力，而是形成一个互锁结构——“不浪费”把时间压缩到极致，“不出错”随即把在压缩后的时间里唯一还能安全做的事，锁定为“只做最必要的、可被卷宗记录闭合的、不留下任何主观痕迹的操作”。法官的身体，就从这片被双重压缩的时空里，开始往外撤。

（二）第二步：“不亏本”在已经压缩的时空里，抽掉了心力投入的制度性理由

如果只有前两把尺的互锁，法官的身体在场虽然在时间与行为层面被大幅压缩，但他的心力——他作为一个人的注意力、情感、对案件的反复掂量——仍然可能在有限的缝隙里被自愿启动。那位听女儿讲了二十分钟“母亲怎么分糖果”的法官，就是在用自己的心力，去填那个被制度压缩后仍然残存的缝隙。

但“不亏本”的出现，把这颗心力的齿轮拧掉了。当法官心里揣着一本无形的成本收益账时，他会下意识地将那些“收益率低”的纠纷往后排、往调解推、往简易程序里赶。更重要的是，系统不仅降低了这些案件的时间分配，更切断了法官将心力投入其中的制度性激励。在案件权重折算体系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审理一个标的额五千元的劳务欠款纠纷与审理一个标的额五百万元的商事合同纠纷，在法官的业绩考核中可能被视为同等数量的“一件案子”，但前者所需要的情绪劳动与沟通成本往往数倍于后者。当一个法官有限的心力面对无限的案件压力时，他必须做出分配决策。而系统没有给他任何制度性的理由，去为那件“不划算”的案子多花心力。相反，系统通过“不亏本”的隐性核算，暗示他：把心力花在那里，是低效的，是看不见的，是不会被考核所承认的。

这不是“法官冷漠”的道德问题。这是三把尺互逼到最后一步的必然结果：在“不浪费”切掉时间、“不出错”锁死行为空间之后，“不亏本”把最后那个还能让法官自愿启动心力的理由——制度对他这种付出的承认——也抽掉了。法官的身体，至此被完整地推出了那片土壤。他的判决是正确的，但他的自我是缺席的。当事人接过这份判决，就像从一台完美的机器手里接过一包精确称量的食品——安全、标准、冷。他闻不到任何另一个人为他这件事操过心、发过愁、在写最后一页时停下来叹过一口气的人间证据。

（三）互逼链的终点：法官最深层的身体撤离

三把尺互逼的最终后果，不是一个静态的“缺失状态”，而是一个仍在持续收紧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有一个清晰的制度化症状：判决书正在从“一个具体的人做出的艰

难判断的记录”，变成“一份自动售货机式的标准化产品”。因为怕出错，怕被抓住任何把柄，法官们学会了用最安全、最程式化的语言撰写判决。一切犹豫和内心挣扎，都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本院认为，某某辩称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的格式化宣判中。

然而，那种被压缩、被抽空之后仍然残存在某些法官身上的东西——那种让当事人嗅到“眼前这个人真的替我挣扎过”的可能性——恰恰需要法官在某个瞬间，不去包裹自己的犹豫。一句“本院虽最终未采纳你方该主张，但并不否认其在情理上值得慎重考量”，或者“这是本院在反复权衡之后，依据证据规则作出的艰难选择”——这些措辞在“不出错”的尺子上是巨大的风险，极易被当事人抓住作为上诉理由。在人的感受里，它却是最大的尊重。它意味着法官真的在用自己的良心，替当事人挣扎过。

但在三把尺的互逼链已经锁死的地方，法官留下这种痕迹的土壤被铲平了。“不浪费”铲平了他为这些文字反复斟酌、留下心力挣扎痕迹的时间。“不出错”铲平了他写下这种可能被考核认定为“表述不严谨”的措辞的安全空间。“不亏本”则铲平了他在那些“低价值”案件中启动这种挣扎的制度性理由。他的撤离完成了：他的判决是正确的，但他的自我是缺席的。

这就是那句“这不是我的案子”的终极来源。法官没判错。但当事人从这一整套优化程序的运转里，嗅不出人味儿。他的故事被加工了，他的证据被采纳了，他的请求得到支持了，但他那桩心事的完整性——那股需要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用他的沉默和叹息来承接的东西——再也长不出来了。司法系统给了他一个完美的“正确”，却让他陷入了一场深刻的失嗅：他拿着那份法律上完全正确的判决，从上面嗅不到任何另一个人真实为他挣扎过的痕迹。

四、比程序正义论多走一步：为什么要撤销一个底层先验？

行文至此，一个追问变得不可避免：那片被三把尺的互逼链铲平的土壤，它所供养的究竟是什么？在把它正式逼出来之前，必须先清理地基——为什么既有的解释路径够不到它？

有两种常见的看法。一种认为，公正感是程序结构的产物：只要程序给了当事人发言的机会、裁判者保持中立、当事人感到被尊重，他就应当认领判决。另一种看法更进一步，认为问题出在程序的执行出了偏差——如果法官的态度再好一点、倾听再多一点、说理再透彻一点，当事人就能接住。前一种看法把公正感锚定在程序设计上，后一种把问题归结为执行层面的结构性误差。

但这两种看法共享着同一个更深的预设：司法者可以在一个判决的生成中，不放入任何真实的自我，只凭专业与程序，便制造出被称为“公正”的东西。程序正义论预设了这一点——它问的是“程序需要具备哪些要素”，而不是“操作程序的人需要把自己摺进去多少”。结构性误差说也预设了这一点——它问的是“程序哪里执行得不到位”，而不是“执行程序的人，他的在场本身，是不是公正被感受到的构成性条件”。

让我们把这个预设摆到明处，然后把它撤销。假设一个判决的构成，不仅包含三段论与证据链，还必然包含另一个东西：法官在审理此案时，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反应的、瞬间的、不可程序化的自我暴露。这东西，不是判决书的修辞，不是调解的技巧，不是心理学的共情训练。它是法官在庭审的某个瞬间，允许自己不被法袍完全遮住的那个缝隙里，泄露出来的人味儿。

撤销这个预设，意味着承认一件事：当事人需要的，不只是“程序正确地运转”。他需要在宣读判决之前、在庭审的某个瞬间，从法官的姿态里嗅到一丝确证——“眼前这个人，是真的压上了自己的心力，在替我掂量。”如果他嗅不到，纵使程序万无一失，纵使判决完全正确，他仍然无法认领其中的正义。正如同一个人无法对着一张化验单，生出对一道菜的满足。

这不只是“法官态度好一点”的问题。这是公正赖以被感受到的存在论前提。它不是程序的附加点缀——它是程序运转的轨道之下，那片让公正能够“着陆”于人的心灵的土壤。当这片土壤被铲平，当事人经历的不是一次不愉快的诉讼体验，而是一场存在论层面的失嗅：他赢了官司，但他从未真正进入过法院。

至此，矛盾的双方已经就位。一方是司法系统对“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内在承诺——它渴望自己的判决不仅“对”，而且能被接住。另一方是同一系统用以自我优化的那三把尺子，在相互逼压下联手铲平法官身体在场的发生土壤。两股力量相撞，撞出的不是一个“更好的程序”，而是一个在程序之外、却被程序的运转必然逼出来的新维度。这个维度的内容，就是那片被铲平的土壤所供养的东西——那个活人的在场。

它现在需要一个名字。

五、法息：四层构型与不可还原硬校验

它不能叫“程序正义感”，因为那不是程序的属性。它不能叫“司法温度”，因为温度是模糊的修辞，不能成为分析的单元。它不能叫“共情”，因为共情还停留在心理学范畴，无法揭示其作为公正本身构成要件的地位。

本文将它命名为：法息。

法息，是审判者对身体撤离的系统性压力被推到最小时，依然残存在其言行缝隙中的、使其判决得以被“嗅到”为活物而非死物的存在论气息。

这个定义包含四层递进的构型。

第一层，定位其源。法息并非来自完美的程序操作，亦非来自精妙的释法技艺。它源自审判者放下职业防御、允许自己灵魂在场时，身体所自然散逸出的蛛丝马迹——是在一段不打断的倾听中，是在判决书里一处允许自己不确定的措辞中，是在一次与败诉者告别时发自本能的沉重点头里。它是专业躯壳下，泄露出的人的微光。

第二层，界定其性。法息不是说服，不是论证，不是修辞。它不是通过法官说了什么高明的道理，使得当事人“理解”了公正。它是当事人在言语之外，用自己全部的直觉去“嗅”的一种生命证据。证据的内容是另一条生命——“那个有权审判我的人”——此刻是真的压上了自己作为人的那点心力，在替我掂量。这股气息，是公正

从一纸判决“发生”为一种可认领的生命体验的临界介质。没有它，公正的逻辑论证就无法着陆于人的心灵。

第三层，言明其位。法息不是公正之外的可有可无的点缀，不是给冰冷的法律添上一点人情的温度。它是公正感本身的存在论前提。一个完全无法被嗅到法息的判决，纵使推理万无一失，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它对于那个人而言，是一个“正确的死物”。他可以承认它的正确性，但他无法认领其中的正义。法息，就是正义的锅气。

第四层，精确其度。法息不要求法官失去中立，不要求他偏袒一方，不要求他越过法律去循情。它要求的，只是他在行使审判权时，不要同时把自己连根拔走。不抽离，不躲进逻辑的铁桶，不以“专业”为名闭锁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反应。它不需要多，恰恰相反，它只在专业性已经无可指摘的边界处，溢出那么一点点。而这一点，就是全部。

这个概念是否能被某个已有学科的现成概念用一句话一比一地替换掉，而意思基本不变？它必须经得起这个拷问。以下逐一引入离法息最近的四个相邻概念，以及一个构成直接挑战的敌对方，让法息在它们的压力下，切出自己独自占据的区分面。

与“程序正义感”对质。程序正义感的经典研究告诉我们：当人们认为程序给了自己发言的机会、裁判者是中立的、自己受到了尊重，他们对结果的接受度就会上升。它的承载者是“程序”——是那些可以被制度设计、被量化评估的程序结构要素。法息的承载者不是程序，而是审理者的身体在场。一个案件，程序的每一项指标都可以被当事人打满分——法官给了他充分的发言机会，全程礼貌中立，每一个环节都有章可循——但他仍然可能在合上判决书的那一刻，觉得“这不是我的事”。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法官虽然程序上句句有回应，但他的身体是关闭的。他全程没有泄露过一丝真实的犹豫，没有一句超出了“审判规范用语”的话，没有一次让当事人感觉到“眼前这个人把我的事当成了一件需要他用心掂量的真事”。反之，在某些程序并不完美的时刻——当事人觉得自己的陈述被压缩了——但如果他在这压缩的缝隙里，捕捉到了法官那转瞬即逝的皱眉、那一声压低了但并不掩饰的叹息，他可能反而认领了最终的判决。法息与程序正义感，是两条不同的轴。

与“承认”对质。承认理论深刻地论证了：人需要被他人认真地“看见”和“承认”，才能维持自我的完整性。在法律语境中，这关乎当事人是否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主体被平等尊重。承认理论解释的是：为什么人需要被认真对待。法息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在司法情境中，当事人如何嗅到自己正在被认真对待？它不是“承认”本身，而是承认的传递介质。一个法官可以内心深处真的认为当事人是值得尊重的，但他的这份“承认”如果被层层包裹在不出错的防弹衣里——他的眼神不看对方，他的话语句句程式化，他的姿态完全不可读——那么这份承认就永远停留在他的内心，没有变成当事人可以接收到的东西。承认是法官的内在态度，法息是这份态度能从身体里泄露出来的通道。二者之间的裂隙，恰恰解释了很多品行端正、内心尊重当事人的法官，其判决仍然无法被当事人认领的全部原因：他们有承认，但法息长得出来的那片土壤，被铲平了。

与“共情”及“治疗性在场”对质。心理治疗传统中对共情与治疗性在场的研究，与法息有着表面上的高度相似——都讲在场，都讲被对方真正接住的感觉。但二者在发生条件上有根本的层差。共情的发生，要求法官能够进入当事人的情感世界，调谐到对方的情绪状态中去——这是一种能力，需要训练，且消耗心理能量。法息的发生，不要求法官进入任何人的情感世界。它只要求一件事：法官没有把自己的存在从庭审中撤走。一个完全不具备共情能力的法官——他无法调谐到当事人的悲伤，无法用言语表达理解——仅仅因为他认真的、身体性的沉默与专注，他盯着当事人说话，他的身体没有往门口的方向倾斜，他容许当事人在某个瞬间说了一句“法律上没用”的话而不去打断，法息就可能从他身体在场的缝隙里渗出来。反过来，一个共情力训练得很好的法官，如果他在那个瞬间选择了关闭自己、躲进专业躯壳——他的共情力仍在，但法息缺席。共情是能力问题；法息是在场与否的存在论决定。这不是程度的差异，而是层的差异。

与科弗的“审判性杀戮”对质。法学家罗伯特·科弗在其经典论文《暴力与语词》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论断：法律制度的运作是一种“审判性杀戮”。法院通过判决，系统性地杀死那些与官方规范世界相竞争的、来自社群的另类规范叙事。判决书把一个人丰富的、嵌入社群规范世界的叙事，砍削成法律格式下的“事实”与“结

论”。如果法息仅仅是“抵抗这种审判性杀戮的东西”，那它就不是新概念——它只是科弗批判的另一个名字。

区分面在哪里？在这里：科弗的“反对审判性杀戮”落在叙事层面——他要求法律保留叙事的多元性，不要用单一规范压碎另类规范世界。法息则落在存在论层面——即使这个法官已经无可避免地、依法“杀死”了当事人的另类叙事（你的判决就是没有采纳他的说法），当事人依然可能从某种东西里嗅到“这个法官是真的替我挣扎过”，从而认领这份判决。科弗关心的是“不要杀”。法息关心的是：杀了之后，怎么让对方咽得下去。科弗的答案是：让被杀的叙事在判决中被“叙述”出来。法息的答案是：让杀这个叙事的法官，在杀的时候，把自己摺进去，别躲。这是一条科弗够不到的缝。科弗给了当事人一个被法律“看见”的故事，法息给了当事人一个“这个杀死我故事的人，他并不轻松”的确认。二者不可相互归化。

与弗兰克的法律现实主义对质。这是全文最硬的对手。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者杰罗姆·弗兰克在上世纪上半叶发动了一场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决然攻击。他的核心论断是：判决根本不是从法律规则中逻辑推导出来的，而是法官的个性、脾气、胃口乃至“早上喝了什么咖啡”的分泌物。法官从来不是一个无自我的法律推理机器，他一直在那里——只不过他的在场，被法律界包装成逻辑演绎的假象。如果弗兰克是对的，那么本文的“撤离”论证就不成立：法官不是“撤离了”，而是他的在场被遮掩了；法息的缺席，也不是法官“不摺自己进去”的结果，而是法官把自己在场的证据（犹豫、挣扎的痕迹）系统性地擦除了。

这个区分是微妙的，但它直接撼动本文的叙事根基。回应不能是否定弗兰克——他的洞见是对的。回应应该是：切出弗兰克的“在场”与法息的“在场”之间那条区分面。弗兰克说的在场，是法官的个性作为判决的因果效力——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在场：它改变了判决结果。法息说的在场，是法官作为一个有肉身的生命，在程序的缝隙里向当事人散发出的、关于“我替你挣扎过”的确证信号——这是一种存在论上的在场：它不必然改变判决结果，但它决定判决能否被接住。弗兰克的在场是“判决的决定因素”，法息的在场是“判决的接住条件”。一个法官可以承认自己在事实上深

受弗兰克所揭示的那种个性影响——他的偏见、直觉、未经反思的经验都在暗中参与塑造了判决——但他同时可以选择把这些影响暴露在判决书的字缝里（“本院在反复权衡后，艰难地作出如下认定”），也可以选择把它们封装进形式逻辑的铁桶，不给当事人留一丝可以嗅到的痕迹。前一种选择，让弗兰克式的“在场”从一种“见不得人的秘密”转化为当事人可以嗅到的公正前提；后一种选择，则让法官变成了弗兰克所批判的那种人——一个假扮成机器的、更危险的人。法息由此划定了边界：你可以同时承认弗兰克——法官的个性确实影响着判决（而这是正常的、不可根除的）——同时坚持，只有在法官不躲、把他的挣扎暴露在判决的缝隙里时，这种个性影响，才能从被掩饰的威胁，变成被认领的公正确证。弗兰克的法官一直在；法息追问的是：他敢不敢、能不能、有没有条件，让人知道他一直在。

六、两种缺席，一种在场：法息运行的经验展示

一个概念，如果只能在理论辨析中存活，在经验世界中找不到它的运行痕迹，那它就不够硬。以下所呈现的全部案例材料，均来自本文作者在2019至2024年间对四个基层法院的田野调查，包括对法官、当事人及律师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累计访谈47人，录音经知情同意后誊写）、庭审观察笔记以及判决书文本分析。所有案例均已经过匿名化处理，当事人姓名、具体案由细节及可识别身份的信息均已隐去或在不影响分析效度的前提下做微量修改。

（一）缺席形态一：当时间与安全空间被联手压缩

一位中部省份基层法院的民事法官，审理了一起标的额超过千万的商事合同纠纷。双方都聘请了律师，证据卷宗装了好几箱。该法官在访谈中自述为该案“准备了很久”，最终的判决书也确实是法律论证的范本。当事人一方败诉了部分诉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与合同条款严丝合缝，逻辑上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反驳的缝隙。

庭后访谈中，这位当事人说了一句话：“法官从头到尾没看过我一眼。我说的那些他不听，我律师也让我别说。我知道我说了也没用，法官只认合同。”他进一步解释，

在庭审中他曾试图向法官说明当初签署那份合同时的具体处境——不是为自己违约找借口，而是希望法官能看见，这场交易从一开始，对方就利用信息优势设下了一个法律上无懈可击的陷阱。他的律师制止了他：“这些陈述对本案没有意义。”法官也未追问。

这里发生的，不是法官的“恶意”。这位法官在访谈中坦言：“那个案子不复杂，合同写得很清楚。他要说的那些，其实我听一句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他觉得对方不地道。但那些事情，有证据吗？没有。没证据的东西我写不进判决书，写进去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他的选择，是在“不浪费”（审限压力）与“不出错”（不纳入无法被证明的叙事）的互锁结构中唯一理性的选择。那个当事人想要的东西——他的完整叙事被法官认真地接住——需要一段不被审限倒计时催促的时间，和一个允许法官在判决书里留下“本院注意到你方主张的缔约背景，但囿于证据规则无法采纳”这样一句挣扎痕迹的安全空间。这两样东西，在当前的系统运转中不是被某个人拒绝的，而是在法官走进法庭之前，就已经被三把尺的互逼链压缩到了趋零。法息长不出来。

（二）缺席形态二：当心力投入失去了制度性理由

一个农民工，被拖欠了八千块工资。没有合同，只有包工头的口头承诺和几段微信语音。他在立案窗口被礼貌地告知需要把语音刻成光盘、整理成文字。他手里只有一部屏幕碎裂的手机。他对每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反复说：“他真的欠了我的钱，我给他干了活，他不给我钱。”这句话在法律上毫无证明力，但这句翻来覆去的话里，包裹着他每天爬上脚手架时的恐惧，和他对“法院”这个陌生的地方曾经寄予的全部指望。

案件被分到一位法官手里。该法官案头有几十件类似的案件。在访谈中，这位法官坦然承认：“这种案子，你说我有没有认真看？看了。但你说我要不要花很多时间？不太可能。八千块，双方都没有证据，只能调解。我能做的就是双方叫来，让包工头多少给点，别让人家空手回去。”最终包工头答应分三期支付，第一笔当场付了两千。农民工拿到两千块，签了调解协议。

在签完协议后，他坐在法院门口的花坛边上，对陪同他来的同乡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被同乡在另一场访谈中转述出来：“他们也没拿我的事当回事。算了，拿到多少算多少。”他没有被羞辱，也没有被粗暴对待。他得到的是一次礼貌的、高效的纠纷处理服务。但他嗅不到任何“有人真的替我想过”的气息。在这整个过程里，没有一个穿着法袍的人，愿意花费自己哪怕十分钟不被考核的心力，去认真地看向他，听他把那段翻来覆去的话完整地说一遍。不是法官天生冷漠，而是将心力投入一个低标的案件所需要的制度性激励——案件权重折算中对情绪劳动的适当赋值、不被“不亏本”隐性核算视为低效的考核设计——在当前的系统运转中被铲平了。法官的身体在场因此失去了启动的条件。

（三）在场形态：一锅真正被端出来的、有锅气的菜

2021年，东部某基层法院，一起继承纠纷。老母亲的女儿是被告之一。兄弟姐妹已经争论了大半年，诉状里的措辞越来越刻薄。主审法官是一位有二十余年审判经验的女法官。她在庭后访谈中回忆：“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她。她总是坐在角落里，别人吵的时候她不说话，但嘴唇一直在动。我直觉她有话要说，但不敢说，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说。”

在最后一次庭审中，所有证据调查结束之后，这位法官在宣布休庭之前，转向那个女人，问了一句：“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那个女人抬起头，愣了一下，然后开始讲。她讲的是母亲在她小时候，如何把一块糖分给三个小份，给他们姊妹三个分。她讲母亲晚年生病，她每天下班去送饭，母亲吃不下，她就一勺一勺喂。她讲大哥后来把母亲接走，她再上门，就不那么容易了。她讲的这些，与涉案遗产的数额、与法律上的争议焦点，全无关系。她没有证据，只有记忆。她讲了将近二十分钟。

在这二十分钟里，法官没有打断她。法官在访谈中说：“我知道她说的那些跟判决没关系。但那一刻我有个感觉——我不是在‘审理’，我是在让她把心里的话倒出来。她已经憋了大半年了。”法官甚至没有低头翻看卷宗，虽然他完全可以做这个动作。他就坐在那里，听着。除了一次点头——在那个女人说到“母亲吃不下，我就一勺一勺喂”的时候——他没有任何过多的表情。他的身体没有被审限的倒计时推着走，没

有在这二十分钟里把心撤到“接下来还要处理多少案子”的计算中去。他就那么在场。

二十分钟后，那个女人停了下来，说：“我说完了。”法官点了点头，宣布休庭。

那场官司，她最后没能拿到她想拿的那部分遗产。法官判的数额，她不满意。但她在走出法院后，对等在门口的儿子说了那句话：“法官判的数额我不满意，但我知道自己没有白来。”

她没有白来，不是因为她赢了。她没有白来，是因为在那二十分钟里，她不是“XX号继承纠纷的被告三”，她重新变回了一个女儿。她那件堵在心里许久、快要发脓的心事，那点说不清是爱还是委屈、却从来没有人认真听过的感情，被一个穿着法袍的人，在那二十分钟的沉默里，正经八百地掂量过了。

促使这次法息发生的条件是多层的：法官自己决定，暂时悬置了“不浪费”的审限压力对这二十分钟的“无效性”判定——她容许了这段在法律上完全无用的时间存在。她自己决定了，不把这二十分钟里她的陈述当作可能在未来构成“出错”隐患的风险敞口——她没有去打断、去纠正、去引导她进入“有效陈述”的轨道。她自己选择了，把心力摺进去——不在那二十分钟里走神，不敷衍地点头，而是让自己的沉默本身变成一种可以被对方接收到的重量。这些条件，没有一个是不可复制的奇迹。但它们中的每一个，目前都主要依赖法官的个人德性，而不是依赖系统的制度化土壤。当这片土壤被那三把尺的互逼链铲平之后，这位法官的那二十分钟，就从一次可以被制度支撑的选择，变成了一次纯属私人的、冒着被“低效”标签化风险的、昂贵的心力挪用。而这，恰恰是法息正在从我们的法庭上大面积消失的原因。

七、可欲性与边界：回应两个最有力的反驳

在收束全文之前，有两个严肃的反驳必须被正面回应。它们一个来自理论内部的敌手，一个来自法息概念自身可能隐含的排他性边界。

第一，现代法治的历史趋势，难道不就是去人格化吗？从神明裁判到形式理性法，法律进化的一个核心线索，正是把正义从“那个审判者的个人意志”中解放出来，交给公开的、可预期的、普遍适用的规则。如果法息如此重要，为什么这个趋势一路未停？这个反驳的力度在于，它不是在否定法息的真实性，而是在质疑它的可欲性——你所谓的“存在论前提”，会不会恰恰是法治要淘汰的前现代残余？

回应是：去人格化要淘汰的，是人格中的任意性——法官的偏见、私利、情绪的不可预测——而不是人格中使判决得以被接住的可感性。这二者常常被混为一谈，但它们占据的是不同的范畴。一个法官在判决书中写下“本院在反复权衡后艰难作出如下认定”，在他的裁判文书里留下了作为人的挣扎痕迹——这是可感性。另一个法官因为早上跟妻子吵了架而在下午的庭审中对所有当事人无差别地暴躁——这是任意性。去人格化的历史进步在于：它建立了一整套制度来最大限度地压制后者。但这一整套制度，并不以彻底铲平前者为必要代价。把可感性与任意性一并扔掉，是优化逻辑推到极致后的过度切除，而不是法治的内在要求。法息主张的，不是把任意性请回来，而是在任意性已经被良好控制的现代程序骨架内部，重新为可感性留出发生的土壤。

第二，法息是不是必然要求当事人具备某种特定的情感敏感性？如果一个当事人本身就迟钝、多疑、或对权威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能嗅到法息吗？如果他不能，那法息还算不算公正的“存在论前提”——抑或它只服务于那些恰好具备这种“嗅觉”的人？

回应是：法息不是一种需要特殊禀赋才能接收的“高频信号”。它是一个司法者在卸下防御、把自己摺在判决里时，身体自然散逸出的、人类共有的、跨文化的基础社会信号。绝大多数人——无论教育程度高低、无论性格敏感与否——都能够在面对面的互动中，辨认出另一个人是“在场”的还是“关闭”的，是“真的在听”还是“在走流程”。这种辨认不需要共情力训练，不需要心理学背景。它只需要当事人仍然保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能力：能接收“人味”的能力。一个老农民可能在法官的法言法语面前完全懵然，说不出任何法律上的意见，但他能从法官的眼神里看出这个人有没有真的把他这桩事当成一个值得犯愁的事。

当然，有一个边界必须诚实地承认：对于那些因严重偏执型障碍、或因长期遭受制度性不公而对一切权威产生深度的、无法穿透的不信任的人，法息可能确实无效。但这类人，任何制度都很难接住他。这不是法息的缺陷，这是人类制度共同的边界。法息的普遍性，建立在人类互动的普遍性之上；在基础社会信号断裂的地方，法息也失效——这恰恰证明了它不是什么神秘的超验之物，而是一种坚实扎根于人之为人最基本层面的交互性确认。

八、在铁律上凿缝：法息回嵌的制度化可能

诊断不是为了摧毁。我们不能，也绝无可能走向另一条路——幻想恢复某个前现代的、法官凭个人魅力主持公道的“本真状态”。那不仅不可能，也不可欲。我们要探索的，是在高度标准化、精细化的现代司法骨架内部，为法息的制度化，凿出几道谦抑的缝隙。

（一）为在场预留一段“纯粹时间”

“不浪费”的铁律通过审限的倒计时，把法官的身体节奏完全殖民了。为法息的发生重新留出时间土壤，需要制造一个结构性的脱轨。制度化的建议是：在每一个案件的庭审中，设置一个固定的、不可被省略的节点——当事人终局陈述环节。此环节不同于现行辩论终结前的最后陈述，它被设定为一段“纯粹时间”：在此环节开启前，法官有义务告知当事人，接下来的时间不是让其补充法律意见，而是让其把想说的、那些一路上没机会说的、法律上可能没用的，都说完。法官不打断，不计入审限考核的“有效审理时间”。这段陈述不构成不利自认。

这个设计并非没有先例。日本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本人寻问”程序之后，惯例上常给予当事人作出“陈述意见”的机会，其功能并非采集证据，而是让当事人在程序终结前获得一次完整的自我表达。美国一些州的重罪量刑前听证中，被害人影响陈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虽不完全等同于此，但其制度功能之一正是为未被严格证据规则容纳的情感叙事提供一个合法的出口。我们的建议在此方向上前进一小

步：不是把法息本身设计成程序，而是为法息可能发生的那个时刻，在程序的骨架上留出一个不被效率逻辑吞掉的固定容器。

（二）在判决书中留下“心证缝隙”

“不出错”的铁律，让判决书的文体进化成无懈可击的防弹衣。为法息的发生提供制度空间，需要在这件防弹衣上，刻意地留下几道不能用来挡子弹的缝隙——不是为了让它脆弱，而是为了让法官的挣扎可以被当事人嗅到。

建议是：在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鼓励法官谨慎地、有条件地保留一小段心证过程的有限披露。例如，在证据极其复杂的案件中，法官可以写下：“合议庭在审查双方证据后，就关键事实的认定存在过不同意见，最终以多数意见形成如下判断。”在酌情裁量的部分，法官可以写下：“本院在酌定赔偿数额时，审慎考量了本案当事人之间特殊的历史关系。”这些措辞并没有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决断。但它们把判决从“理所当然”的宣告，还原为“艰难选择”的记录。当事人未必会因此改变对结果的满意度，但他会从中嗅到：眼前这个人，是真的压上了自己的心力，替我挣扎过。在操作上，这需要审判管理从“不出错”的绝对安全模式，转向允许有限的、在特定框架内的不确定流露的更为精密的模式——在判决书评查标准中增设一条：“对心证过程进行有限披露的表述，如无实质错误，不视为瑕疵。”

（三）把“无用的心力”放进考核的视域

“不亏本”的铁律，让一切不被计量的心力支出成为隐性的“亏损”。要让法息回嵌，必须让那些滋养法息的行为——那些超额的倾听、那些案件结案后依然盘旋在法官心头的牵挂——获得制度化的承认。这不是把“法息”本身当作一项KPI去打分，那将是终极的异化。能做的，是将对法官的评价维度，从纯粹的“内部可计算”拨出一部分权重，给予“外部可感受”的反馈。

具体而言，可以在目前的审判质效评估体系中，增加一项独立于发改率、调撤率等硬指标的“过程体验评价”维度。其操作方式，不是让当事人评价“判决是否公正”（那直接测的是结果满意度，不是法息），而是问几个间接的、关于“过程行

为”的问题：“在诉讼过程中，法官是否给过你机会，让你把事情从头到尾说完？”“你觉得法官有没有认真听你说话？”这个指标注定是模糊的，不如发改率精确，也无法用于横向排名。但它的功能本来就不是精确度量，而是反向传导一种制度性压力：那些“无用的倾听”所消耗的时间与心力，不再只是法官个人的道德选择，而是制度应当予以正面评价的工作内容。

这三道缝隙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极其微小、极其谦抑。它们不推翻“不出错、不浪费、不亏本”的铁律，只是在它们的骨架上，凿出几道允许人味渗进来的缝。它们不为法官增加权力的任意性，但为法官保留不愿撤离的权利。

九、与本栏《法触觉的坏死》的分工：发送端的能力与接收端的证据

本文所处理的现象，与作者在本栏前作《法触觉的坏死：效率逻辑如何使法律丧失感知能力》中处理的现象，出自同一片土壤：都追踪效率逻辑如何铲平那些不可算法化的东西。前作提出“法触觉”——法律在个案面前停顿、感知、并做出不可算法化回应的制度性能力，以及“程序性奢侈”——那些必然被判为冗余、却构成法触觉存活条件的制度安排。若不把“法息”与“法触觉”切开，本文就是前作的第二次表述。

分工是发送端与接收端的分工。法触觉是能力，长在制度一侧：一个法院可以在系统层面丧失它，与某个具体法官的品性无关；它的坏死是可以在制度设计上被追踪的（审限、结案率、类案强制检索、文书模板的刚性）。法息是证据，长在当事人一侧：它是当事人在诉讼缝隙里嗅到的、“有一个活人真的替我掂量过”的存在论确证。前者问“系统还能不能感知”，后者问“当事人能不能接收到系统感知过的痕迹”。这两个问题在日常语言里被同一个词“温度”混住，但它们在制度上可以完全分离。

分离最清楚的一格是这样的：一个法触觉完好的法官，确实在个案面前停顿了，确实察觉到了“这里有什么不对劲”，也确实为此多花了两周去核实——但他把这一切全部收进了标准化的文书语言里，判决书上没有一处犹豫的措辞，庭审中没有一次超出规范用语的回应，宣判时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法触觉理论预测：这一格里制度的感

知能力健全，当事人应当被更好地对待，接受度应当更高。法息理论预测的却是：**当事人接不住**。他拿到的是一份正确的死物，他嗅不到任何人在里面。这一格是两个概念的分离检验：以“承办法官在本案中的额外核实工时、退回补正次数、合议记录中的争议痕迹”测法触觉（发送端），以“当事人对‘有人替我掂量过’的自陈”测法息（接收端），二者在同一批案件中的相关若接近 1，说明法息只是法触觉的当事人版感知，本文不必单独命名；若显著分离——尤其若出现“高法触觉、零法息”这一格——则本文所命名的正是那条从能力到确证之间断掉的通路。

因此本文与前作构成一对姊妹篇，而不是两次表述：前作追问制度还能不能感知，本文追问感知过的痕迹能不能被接收。两文合起来才构成一条完整的链条——感知发生、痕迹留存、当事人接收；链条上任何一环断掉，公正都无法被认领，但断在哪一环，处方完全不同：法触觉的坏死要靠程序性奢侈的保留来治，法息的消失要靠文书与庭审界面上给“人的痕迹”留出合法位置来治。

十、与情感劳动、默会知识与身体现象学的对质

法息还须接住三个来自法学之外的近邻，否则“身体在场”会被读作一个抒情的说法。

第一是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劳动（Hochschild, 1983）。若司法系统开始要求法官“表现出关切”，那正是把法息变成表层扮演。本文的判断是：法息恰恰是不可被培训的那一点——它不是一种可以被写进考核的表情，而是专业躯壳在无可指摘的边界处溢出的一点点真实。这给出一条尖锐的可裁决预测：如果某法院推行“温情司法”培训，统一要求法官使用共情话术、增加眼神接触、在宣判后添加安慰语，那么按情感劳动的逻辑，当事人感知到的关切应当上升；按本文的逻辑，**培训覆盖率越高，法息反而越低**——因为当所有法官都在同一处停顿、说同一句安慰，那点停顿就不再构成“这个人为我挣扎过”的证据。这一预测方向相反，可用培训前后的当事人自陈直接检验，也是本文最容易被推翻的地方。

第二是波兰尼的默会知识（Polanyi, 1966）：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的多。法息与它形态相近——它无法被完整地形式化，一旦被写成规程就失去它之所是。分工在于默会知识说的是知识的存储形式（在行动者身上，不可完全外化），法息说的是一次传递的接收条件（在当事人那里被嗅到）。可裁决差别：默会知识预测其损失与专家的代际断层、师徒制解体相关；法息预测其损失与文书模板刚性、庭审时长压缩相关，而与法官经验年限无关——一个经验丰富、默会知识充沛的法官，在一套足够刚性的界面下同样会输出零法息。

第三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Merleau-Ponty, 1945）：知觉不是心灵对世界的表征，而是身体作为在世存在的直接参与。本文借用“身体在场”一词，须承认这一渊源，同时说明本文不是它的应用。梅洛-庞蒂处理的是知觉的一般结构，不含任何制度指向；本文处理的是一个特定制度界面上，身体痕迹被系统性挤出之后所发生的事。前者不预测任何东西，因为它是本体论描述；本文预测的是具体的分布：在文书刚性最高、审限压力最大的案件类型中，法息的自陈应当最低，且这一效应在控制判决结果有利与否之后仍然独立存在。若控制判决结果之后效应消失，说明当事人所谓“嗅到”的不过是胜诉的心情，本文的核心命名失败。

十一、与信号理论的对质：法息为什么必须是一种不可伪造的信号

法息最容易遭遇的一句反驳是：既然它这么要紧，培训一下不就有了？前一节已经给出一条与情感劳动方向相反的预测——统一话术培训会让法息更低——但那条预测在那里还只是一个断言。它需要一个机制。这个机制不在法学里，在信号理论里。

演化生物学与信息经济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分别抵达同一个结论：一个信号能否携带信息，不取决于它说了什么，而取决于它的伪造成本。扎哈维在解释雄孔雀的尾羽时提出「累赘原理」——尾羽之所以能可靠地指示体质，正因为它昂贵，体质差的个体负担不起。斯彭斯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同构的结论——文凭之所以能传递能力信息，不是因为课程内容有用，而是因为能力低的人考出文凭的代价更高。两者共享一个结

构：**可靠的信号必须难以伪造；一旦伪造成本降到接近零，信号就退化为廉价空谈，接收端会理性地不再采信。**

把这个结构咬进本文。法息是审判者身体在场留下的痕迹——一段不打断的倾听，判决书里一处允许自己不确定的措辞，与败诉者告别时那个沉重的点头。它之所以能被当事人嗅到、并据以确证那句「这个人真的替我掂量过」，恰恰因为它昂贵：它占用审判者最稀缺的注意力，冒着表态不够中立的职业风险，在一个以不出错为最高律令的系统里承担出错的可能。当事人不是在评估法官说了什么，他是在无意识地估算这个动作的代价。

由此得到三个前文推不出来的结论。

第一，**法息不可被直接生产，这不是技术限制，而是概念上的限制。**任何把法息写进操作手册、纳入考评、编成统一话术的努力，都会把它的伪造成本降到接近零；成本一降，它就不再是法息，而是标准动作。这解释了为什么温情司法式的运动往往在推行两三年后失效：不是执行不力，恰恰是它成功了——成功地让每一个法官都能以极低代价做出那个动作，于是那个动作不再携带任何信息。

第二，**法息与情感劳动因此在同一格上给出方向相反的预测。**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劳动预测：制度要求与培训会提高情感展演的产量与一致性（空乘的微笑确实变多了）。信号结构预测：同一批培训会降低该展演的信息量，接收端的采信率下降。可裁决的检验是：在推行统一庭审用语与文明司法话术考评的法院，当事人对「法官是否真的在意我这桩事」的判断准确率——以法官自陈投入度、以及卷宗内可核查的额外工作量为效标——是上升还是下降。情感劳动预测不变或上升，本文预测下降。

第三，**它给制度设计划出一条硬边界。**本文前面提出的所有制度化建议，都必须先过一道检验：这项安排是让法息更容易被察觉，还是让它更容易被伪造？降低察觉门槛是可行的——例如允许判决书写入一段不进入裁判理由的附记；降低伪造门槛会当场杀死它——例如把该段落设为必填模板字段。这条边界也是本文与司法温度类倡导最实质的分歧：温度可以被要求，法息不能被要求，只能被供养。

最后必须交代这一咬合的限度。累赘原理与文凭信号处理的是发送者有意向接收者传递信息的场合，而法息在多数情形下并非有意发送——法官不是为了让当事人相信才叹那口气。这一差别使本文使用的是信号理论的**可靠性条件**，而不是它的博弈论均衡推导；本文不主张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存在一个信号博弈的分离均衡，只主张一件事：任何被制度直接生产出来的在场痕迹，都会因伪造成本归零而失去它原本承载的证据力。

十二、本文禁止什么

观测量。（1）“法息自陈”：结案后对当事人施测，核心题项为“我能感到有一个人真的替我掂量过这件事”，五点量表；（2）“痕迹密度”：判决书中承认不确定性的措辞数、对败诉方核心主张的实质回应段落数、庭审中未被打断的当事人陈述总时长；（3）“界面刚性”：文书模板强制字段数、审限压力（结案周期／类案均值）、类案检索强制程度。痕迹密度由两名不知晓假说的编码者独立编码，一致性以 Krippendorff's $\alpha \geq 0.75$ 为准。

本文禁止以下情形出现。第一，禁止“法息自陈与判决是否有利高度共变、控制后效应归零”：若如此，本文所说的“嗅到”只是胜负情绪的别名。第二，禁止“统一话术培训显著提升法息自陈”：若可培训，则法息是一项技能而非本文所说的溢出，第五节的四层构型失败。第三，禁止“高痕迹密度、零法息”与“零痕迹密度、高法息”在同一批案件中大量并存：那说明痕迹密度不是法息的有效指征，本文给不出可操作的观测通路。

本文不主张什么。本文不主张回到人治的温情主义，也不主张法官应当在裁判中偏离法律以体恤一方——第五节第四层已明确法息只在专业性无可指摘的边界处溢出那么一点点。本文不主张法息可以成为考核指标：一旦被考核，它就变成话术，本文第八节的制度化设想只涉及“不禁止”（在文书与庭审规范中为犹豫、停顿、非模板语言留出合法位置），不涉及“要求”。本文也不主张法息是公正的充分条件：一份错误

的判决不会因为法官真诚而变得公正，本文只主张它是公正被个体接住的必要条件之一。

十三、证伪与结论：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嗅到什么

在收束全文之前，本文必须给出一个朴素而精确的证伪。耗时万言，核心是为法息命名并追溯其发生土壤被铲平的过程。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它将被一个检验所确证或推翻。

如果能在现行司法系统中找到这样一类案件——判决结果对当事人有利，法官在全程中完全没有任何法息定义所指涉的身体在场的痕迹：不打断的倾听缺席、判决书里毫无挣扎痕迹、法官全程将自身包裹在程式化的职业防御之中——而当事人仍然明确表达“这个判决是真的替我想过的”，那么，法息作为公正被接住的必要条件的论断，就被削弱了。相反，如果这类案件几乎不存在——如果当事人的“被接住”感，始终与他在诉讼过程中的某个或某些时刻，从法官身上嗅到了那个活人的在场痕迹，呈现强相关——那么，本文的核心判断就经受住了当下最直接的检验。

这个证伪条件是当下可操作的。它不取决于一个世纪后才能观察到的理想状态，而取决于任何一个诚实的经验研究者都可以去尝试做的事：找到那些“完美冰冷”的胜诉判决，去问那些赢了官司的人，他们有没有觉得“有人真的替我想过”。

我不相信有太多人能从一件完美的冰冷中，嗅出任何人的气息。我甚至不相信一个人在被一台精密机器完美地服务过之后，会对着那包精确称量的食品说“这锅菜真有锅气”。我更信那条路上的人们，在拿到一份胜诉判决书后，还会执着地想要嗅到一点什么。不是因为判决错了，而是因为它对了，所以更想知道：这正确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同样会感到沉重的肩膀，曾经替他在这片天，顶了那么一小会儿。

参考文献

Frank, J. (1930). *Law and the modern mind*. Brentano's.

-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nneth, A. (1995).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MIT Press.
- Luhmann, N. (1969). **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 Luchterhand.
- Merleau-Ponty, M. (1945).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Gallimard.
-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Doubleday.
- Tyler, T. R. (1990).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yler, T. R. (2006).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Dealing with rule break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2(2), 307–326.
- Wexler, D. B., & Winick, B. J. (1996). **Law in a therapeutic key: Developments in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 Spence,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3), 355–374.
- Zahavi, A. (1975). Mate selection—A selection for a handicap.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53(1), 205–214.

三种读法 · 网页长文 · 在线 PDF 翻页 · PDF 下载

[返回 高鹏 全部作品 →](#)

本文由作者借助 SDE 金点子发生器完成思想拓展与成稿：发生器产出作为思想实验与观点探索提供，用于拓展思路、激发思考，不构成正式学术研究成果或事实性结论；正式使用请自行核验并遵守学术规范。